

时空片断



金庸：一事能狂便少年

10月30日,94岁的金庸在香港去世。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市,1948年移居香港,是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明报》创办人、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金庸此生唯一一次独自坐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酒席,是在一次葬礼上。穿白袍的男仆在旁斟酒盛饭。那时他才九岁,不会喝酒,只做样子假装喝半口,男仆马上把酒杯斟满。

那是1932年的初冬,去世的是舅舅徐申如的儿子、大诗人徐志摩。金庸在散文集里记录的这一幕发生在他的出生地杭州城边的海宁袁花镇。

乱世里,海宁保持着一份难得的从容与安宁,使他平静地度过飘逸着书香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读书的嗜好伴随金庸走过一生,而他骨子里的桀骜早在年少时已有踪可循。

1941年9月,还在读高中的金庸在浙江《东南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他的一位好友被训育主任教训,末了训育主任说:你真是狂得可以!他在文章里写道:狂气与少年似乎是不可分离的。固然,这可以大闹乱子,但未始不是某种伟大事业的因素。我要这样武断地说一句: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文章的题目就叫《一事能狂便少年》,提到的这位友人不知是真有其人,还是他改编了自己的经历。因为一年多前,他本人刚刚因为在高中壁上写了一篇讽刺训导主任的文章而遭到开除,不得不换到另一所高中。

中学毕业后,他考到重庆一所大学念外交系,但由于大胆直言再次被开除。他曾在访谈里提到:我的性格自由散漫,当外交官纪律比普通人要严得多,有外交部的朋友跟我说,你这个个性,明天进来后天就被开除了。于是,命运把他带进了人生的另一个方向。(据《新京报》陶若谷文)

历史散叶



朱珪： 半生惟独宿，一世不言钱

朱珪,清乾嘉时期的两朝名臣、嘉庆帝的恩师。嘉庆对他曾做出“半生惟独宿,一世不言钱”的高度评价。乾隆二十四年(1759),朱珪在京察中被列为一等,不久后就被外放为官,于乾隆四十年(1775)被召回京城任职。一年后,朱珪正式成为皇十五子颀琰的老师。(据《中国档案报》郭琪文)

哪!我想了想,就在扉页上写道:王愿坚赠,落款是翁亚尼代笔,附上信,顺手用出版社包书的旧牛皮纸包起来,就寄了出去。

5月14日,家里电话响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同志打过来的。他在电话中对我说:习近平总书记收到了您的来信。总书记表示,感谢您赠送《王愿坚文集》,看到他的作品,就想起当年与他交往时的情景,至今都很怀念他。总书记祝您身体健康,晚年幸福。中办的同志还说:总书记要回赠您两本他自己的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共两册。

5月15日,邮局的同志就给我送来了总书记回赠的书。夜深人静,我满怀崇敬拜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第二卷的317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写道:

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一件事情。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习近平总书记又在文中还曾写道:(愿坚说)如果你们对人民的心声能了解到这个程度,那对施政是不是很有帮助呢?我说,你说得太好了,我一定谨记这句话。(据《党建》)

商业一条街的发展也让天津的治安、卫生、绿化等各方面建设得到带动,天津的商贸搞得红红火火。在这时,中央一纸调令,他离开天津南下,走进香港远东金融大厦39层,走上了自己人生的又一个新阶段:在香港创办中国光大(集团)。

后来,光大集团越做越好,王光英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很多国际友人成了他的座上宾,比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前副总统蒙代尔、前国务卿基辛格等。当时竹下登出任日本首相后会见的第一位外国客人就是王光英。竹下登对当时的日本驻华大使中岛说:中国有个王光英,问一问我们日本人,能不能在什么事情上为他效劳?后来,三菱信托银行来华投资,对光大的投资为中国第一。

1978年,邓小平从日本访问回国,找王光英谈话,要他在北京造一座高楼。邓小平说话言简意赅,但王光英立刻理解了他的意思,并迅速造了出来,这就是著名的京广中心。在1989年之前,它属于全中国最高的楼。大楼刚一封顶,邓小平就前来登楼视察,他俯视北京,说道:发展才是硬任务。这句话后来在公开发表时改为:发展才是硬道理。(据《作家文摘》)

近平是个很谦虚的人,主要是我讲,他听。我给他讲了些革命传统故事,很多是我当年写《星火燎原》时采访老红军、老八路时的素材,还讲了柳青等优秀作家深入基层一线体验生活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事。近平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愿坚还说:近平是个好青年,你在他身边就觉得他满身朝气,胸中有抱负,还有惊人的亲和力。

1988年年底,中国作家协会安排愿坚和

在著名军旅作家王愿坚去世27年后,收录了其全部文学题材作品的七卷本《王愿坚文集》,于2018年1月正式出版。遵照王愿坚的遗愿,他的夫人翁亚尼在第一时间将文集寄送给了习近平总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收到《王愿坚文集》后,深情地表示:看到他的作品,就想起当年与他交往时的情景,至今都很怀念他。

习近平和王愿坚是怎样成为文友的呢?翁亚尼写下了感人至深的回忆文章。

从心底里深爱这位年轻人,愿坚与习近平同志交往已久。当时愿坚是部队比较有名的作家,找他的人很多,大多是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其中也不乏老革命的后代,但愿坚回家很少谈起与他们见面时的情形,只有见了习近平同志,才不厌其烦地向我述说一番。

作为一个抗战时期就投身革命队伍的军旅作家,愿坚曾立下“写尽红军英雄志”的宏愿,新中国第一批授衔的老将军他大部分都采访过,已经把红军长征三部曲上中下写出了提纲,所以他是“故事篓子”。和习近平同志见面时,说着说着就会情不自禁地说到红军的故事,小到战斗细节,大到战略部署,都讲得活灵活现。而习近平同志呢,一听到这些故事,就立马从口袋里摸出小本子,非常认真地记下来。愿坚是个善解人意的作家,他知道习近平同志想听哪一方面的故事,习近平同志也渴望能从愿坚口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于是,几年的交往,他们感情越来越深。真是高山流水遇知音,愿坚从心底里深爱这位年轻人。

记得有一次,愿坚对我说:真没想到,近平的阅读量大,仅文学这一项,古今中外名著他读了很多,有的还不止读过一遍,让我大吃一惊。许多故事情节他能很详细地随口

讲出来,有些段落甚至能完整背诵。不仅能讲会背,他还能准确说出作品主题思想、社会背景、创作风格、写作特点和作家的基本情况,这真是了不起!除文学之外,中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著述他也读了很多。

愿坚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时,还常向各部队来的青年作家有声有色地讲习近平同志的好学精神。至今好多军艺的学生来看我时,都说他们对此记忆犹新。

习近平与王愿坚的文学情缘

翁亚尼

一谈起习近平赞不绝口

愿坚性格内向,一脸严肃,不苟言笑,更不轻易无原则地夸奖一个人,他嘴里的褒义词是很吝啬的。但一谈起习近平同志,常常赞不绝口。

1982年,习近平同志从中央军委办公厅调到河北正定任职,愿坚去送行话别,回来一进家门,就兴奋地对我说:如今很多人都想留在大城市、大机关,他却选择了下基层农村。

我问:谁呀?

习近平。愿坚接着说:近平作为习仲勋同志的儿子、耿飏同志的秘书,他完全可以去一个条件好的地区和岗位,但他却去了河北正定县,而且还是他自己要求去的。他已经在陕北偏僻的农村梁家河插队七年了,现在有些年轻人削尖脑袋往大城市、大机关、大公司钻,他却偏偏要去艰苦的地区继续磨炼自己。也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好样的,近平离开北京,会在更广阔的天地飞得更高更远。

那你们俩都聊了些什么?我问。

红色资本家 王光英

高语阳

抱的是一位红色资本家,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自此,王光英就有了“红色资本家”的称号。

虽然没能成为共产党员,但也因此,他成为不可替代的“红色资本家”。

在香港创办中国光大集团

文革时期,因受到刘少奇的影响,王光英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八年多。1977年,王光英平反,很快又被委以重任。

1979年,他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分管财贸。他恢复了天津的老字号、大商店,恢复天津独有的小吃和糕点,保留经营特色。他打造商业一条街模式,除了商品零售店,又发展银行、邮电、运输、饭馆、旅馆、修理等服务行业配套。

10月29日晚9点28分,王光英去世,享年100岁。王光英的名字和周恩来口中的“红色资本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新中国发展历史上不可抹去的一个名字。

被周恩来称为“红色资本家”

1956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请当时正在开会的全国工商联全体执行委员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时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的王光英积极带头参加改造,他由原来的资本家变成了公私合营的“半公家人”。

1957年,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由东北转道天津赴上海访问。飞机停在天津机场时,临近中午,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贵宾室请伏罗希洛夫一行吃饭,天津几位工商界代表人士作陪,王光英是其中之一。席间,王光英在周恩来的示意下向伏罗希洛夫敬酒,对方高兴地举杯一饮而尽,并对他说:这不是平常的事情,中国经过长时间的流血革命,现在找出一个不用流血的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这是有世界意义的。

说完,伏罗希洛夫拥抱了王光英。周恩来在一旁说:您拥